

文物映中华

信物里的古典浪漫

周年

相较于现代人直白热烈的情意表达,古人表情达意更显含蓄深沉、温柔内敛。于是,器物便成为传递情意、寄托相思、坚守诺言的重要媒介。七夕将至,回望那些承载着深厚爱意的古典信物,体悟中华文明里的诗意浪漫与纯粹初心。



玉石,是贯穿古今、正统贵重的定情信物。《礼记·玉藻》有云:“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。”玉象征着纯洁无瑕、温润谦和的君子德行,也被视作真挚爱情的化身。玉石质地坚硬通透,历久弥新,契合了古人对爱情坚贞不渝、始终如一的美好期许;其温润内敛的材质,也对应着情深不语、岁岁相守的爱情真谛。

先秦礼乐盛行,玉佩成为男女互通情意的信物。《诗经·郑风》有言:“知子之来之,杂佩以赠之;知子之顺之,杂佩以问之。”晨昏盥漱之时,恋人相依相伴,男子将随身多年的组合玉佩赠予佳人,许下相守终老的誓言。传统玉佩由多片玉饰串联而成,环环相扣、紧密相连,寓意恋人相伴相依、此生不离。

除组合玉佩外,玉簪、玉镯亦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定情之物。《礼记·内则》载,女子十有五年而笄。古代女子十五岁行笄礼,束发戴簪,标志着少女初长成,可许婚嫁良缘。在古典文学作品中,玉簪常作为恋人之间的定情信物,寄托相守一生的心意。玉镯通体圆润,象征爱情圆满顺遂、岁岁团圆。

绳结与青丝是民间常见的定情信物,承载着寻常人家的儿女情长;即便是富贵门第,男女私下相许之时,也常以绳结、青丝暗寄心意。

丝线编织情思,将满心爱意缠绕于经纬之间。其中以同心结最具代表性,匠人以彩线反复缠绕编织,绾成两两相扣、无始无终的结式,寓意恋人永结同心、相守不离。魏晋时期,同心结在民间广为流传,成为男女定情、别离、相会的专属信物。南朝梁武帝曾赋诗“腰中双绮带,梦为同心结”,细腻描摹出恋人日夜牵挂、盼与爱人相守朝夕的缱绻心意。

将青丝作为信物相赠,更体现了一种极致的赤诚与浪漫。因为古人秉持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的理念,恋人互赠青丝,是交付全部真心、全然信赖的体现。一缕青丝朴素无华,承载的情意却重逾千金。汉诗有云:“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疑。”唐宋婚俗中,有新人各取一缕发丝绾结一处的合誓之仪,以此许诺此生恩爱相守、死生不负,后世俗称结发礼。

铜镜与团扇,藏着古代女子含蓄内敛的缱绻相思。

铜镜是古代婚嫁定情的重要器物,镜面莹亮,可照容颜,镜背常镌刻鸳鸯、同心、龙凤等吉祥纹样,寓意恩爱成双、忠贞不渝。古人常以镜为信,取心如明镜、爱意专一之意,许诺岁岁相伴、初心不改。南朝乐昌公主与徐德言“破镜重圆”的典故流传后世——乱世别离之际,夫妻将铜镜一分为二,各执半面,作为离散之后相认的信物。

团扇是古代女子贴身使用之物,闺中女子有时会在扇面描摹花鸟、题写情诗给心仪之人。团扇形制圆满,象征团圆相守,也叫“合欢扇”,汉代《怨歌行》即有“裁为合欢扇,团似明月”之语。

源自山野的花草芳枝,作为极富诗意的一类定情信物,尽显古人“天人合一”、感物寄情的浪漫情怀。

芍药被誉为“上古情花”,在先秦时期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定情花卉。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里的“维士与女,伊其相谿,赠之以勺药”,记载了先秦春日一场温柔的爱情告白;溱河河畔,春光烂漫,



明代鸳鸯荷叶玉佩
湖北省博物馆藏



铜镜
西汉—大乐黄富—蟠螭纹铭文
扬州博物馆藏



唐代周昉(传)《挥扇仕女图》局部
故宫博物院藏

青年男女结伴出游,嬉戏结缘,互生爱慕,便以芍药相赠,私定情意。芍药温婉雅致、花期悠长,且“药”与“约”谐音,暗含相守之约。

红豆别名“相思子”,是千年以来深入人心的相思信物。王维的千古名句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”,让红豆成为相思与爱情的代名词。红豆色泽赤红热烈、质地坚硬耐久,象征爱意纯粹炽热、经年不变。后世民间,相隔两地的恋人互赠红豆,以寄情思,小小

一枚红豆,承载着山水相隔的牵挂与日夜不休的思念。

青梅则象征两小无猜的纯粹爱恋。李白有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的诗句,描摹了小儿女一同嬉戏、朝夕相伴的童年时光。这份源自儿时、干净澄澈的美好情愫,被后世视作珍贵的初心情意。

(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,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清代改琦《双红豆图》
上海博物馆藏

掌故丛谈

磨喝乐:宋代风靡一时的七夕“文创”

郑学富

在宋代,磨喝乐堪称风靡朝野的“文创产品”,其多以土、木、蜡等原料塑造成憨态可掬的婴孩形象,形制精巧、饰样丰富,是宋代女子七夕祈福拜愿的吉祥物,承载着民间祈愿吉祥、子嗣绵延的美好期许。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说磨喝乐“乃小塑土偶耳”;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称其“多着乾红背心,系青纱裙儿;亦有着背儿,戴帽儿者”。除了古代文献,从绘画、陶瓷、雕刻作品中也可见磨喝乐的造型、服饰及相关风俗。

开封大学大观博物馆收藏着一尊宋代白釉红彩磨喝乐坐像,空心模制,童子面目清秀,略涂红粉,蚕眉细目,双手持一枝未盛开的莲花于胸前,盘腿而坐,衣襟用红彩勾勒,黑彩勾画眉目,生动再现了宋代七夕民俗风物的精巧工艺与独特审美,鲜活映照出宋代的民俗文化风貌。

唐代有“化生”的风俗。化生的本义指万物由阴阳二气交感而产生、变化的过程,古人据此有“七夕弄化生”之俗,即祈求生子。《唐岁时记事》说:“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,浮水中以为戏,为妇人宜子之祥,谓之化生。”唐代诗人薛能在《吴姬》中也有“芙蓉殿上中元日,水拍银台弄化生”之句。唐代的化生是用蜡做成的偶像,为妇女求子的祈福品,到了宋代就演化为磨喝乐。尚未生育的女子通过祭祀祈求早生贵子,



宋代白釉红彩磨喝乐坐像
开封大学大观博物馆藏

已生育的女子则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。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唱道:“捏塑彩画一团泥,妆点金珠配华衣。小儿把玩得笑乐,少妇供养盼良嗣。”

磨喝乐是梵文的音译,有时也译作“摩睺罗”。宋人不仅把磨喝乐作为供奉的偶像,而且还赋予其娱乐性。孩童效仿磨喝乐的造型做游戏,也是七夕节时尚的民俗活动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描述:“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,盖效摩喝乐。儿童辈特地新妆,竞夸鲜丽。”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载:“市井儿童,手执新荷叶,效摩睺罗之状。”童子手执新荷叶或莲蓬和未开之荷花,也寄寓着健康成才的美好愿望。

在商品经济和文化发达繁荣的宋朝,磨喝乐系列产品在京城乞丐市场十分畅销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七月七夕,潘楼街东门外瓦子,州西梁门外瓦子,北门外、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,皆卖磨喝乐。”金盈之的《醉翁谈录》说:“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,端正细腻,京语谓之摩睺罗,小大甚不一,价亦不廉。”磨喝乐确实价值不菲,据说一对可卖数千钱。据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记载,南宋都城杭州七夕卖磨喝乐最繁盛的地方是后市街的众安桥,尤以苏州工匠制作的格外精巧。进入皇宫内廷的磨喝乐,多由金银制作而成。

大典撷珍

《永乐大典》是明代官修的大型类书,以明初内廷文渊阁藏书为基础编纂。因其保留了许多久佚宋元古书的文本,文献价值很受学者看重。近代以来,其遭际与国运同沉浮,寄托了国人深厚的民族情感,由此也备受关注。

1399年,朱棣发动“靖难之役”,1402年攻占南京,从侄子朱允炆手里夺得帝位,次年改元永乐。朱棣下令广召群儒,编纂了《永乐大典》《五经大全》《四书大全》《性理大全》等多部大书,其中篇幅最大的便是《永乐大典》。

永乐元年(1403年)七月,朱棣以“天下古今事物,散载诸事,篇幅浩穰,不易检阅”,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“悉采各书所载事物,类聚之而统之以韵,庶几考察之便,如探囊取物”,辑录的范围是“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”,还特别强调“毋厌浩繁”。解缙奉命组织了140多人的编辑团队,仿元阴时夫《韵府群玉》和宋钱珮《回溪先生史韵》的体例,用时17个月编成《文献大成》。朱棣嫌该书收录不全,永乐三年(1405年)下令重修。永乐五年(1407年)十一月,重修完成,御赐名为《永乐大典》。

《永乐大典》规模宏大,全书11095册,共计22937卷,其中仅目录便有60卷。卷帙如此浩繁的一部大书,仅用3年左右的时间即编纂并抄录完成,当时调用的人力物力之巨,不难想象。史载,纂修团队多达2000余人,内外官员、四方宿儒、善书文士,甚至僧人、医官,都受命汇集南京,从事纂修、缮写工作。

参与人数虽多,但编纂机构组织得井然有序、分工明确,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:

统筹协调工作由监修、副监修负责,他们都是朝廷高官。监修3人,即资善大夫、太子少师姚广孝,礼部尚书郑赐,侍读学士解缙。副监修也是3人,即刑部侍郎季夔、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、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。

都总裁、总裁、副总裁负责组织编纂,他们大多是学有根底的文人学士。都总裁由人称“两脚书橱”的布衣儒士陈济担任,翰林院学士王景、侍读学士王达、国子监祭酒胡俨、司经局洗马杨溥为总裁,翰林院侍读邹缉、修撰王褒等20人为副总裁。副总裁往往每人负责一个专业领域,如林环为《书经》副总裁,高得咏为《三礼》副总裁。

基层修书人员包括:纂修,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,由礼部挑选京中和外任低阶官员以及四方宿学老儒充任;缮录,简选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充任,负责抄写;绘图,负责插图绘制;圈点生,负责在抄成的书册上加盖表示断句与标识声调的红色圆戳。从嘉靖副本每册最后所题纂修人员名单看,每册由一人誊抄,二人圈点。至于为何由二人圈点,可能是因为圈点有断句与声调两种,二人分工,各司其职,可避免淆乱。

此外,另派催纂5人,督促编辑工作进度。

具体分工方面,注意让参与者各尽所长,专业领域往往吸纳专业人士参与。如王彦文精研《诗经》,著有《诗经旁通》,即出任《诗经》副总裁;医经副总裁由太医院御医蒋用文、赵同友担任;释教副总裁由释道耿充任。

参与纂修的2000多人中,史书上留下姓名的不多。不过,近百年来,学者们经过考证,能列出的纂修人名单越来越长。1938年,郭伯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《〈永乐大典〉考》,其第三章《纂修诸人考略》列出194人,其中《明实录》所载总裁、副总裁之外者有166人。1965年,王重民在《文史》第四辑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考》,考出246人(内1人重出,并基本囊括了郭伯恭所得)。1987年,朱鸿林在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5卷第2期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考补》,又增补41人。之后,张金梁在《文

卷帙浩繁 众力成编

《永乐大典》的纂修
刘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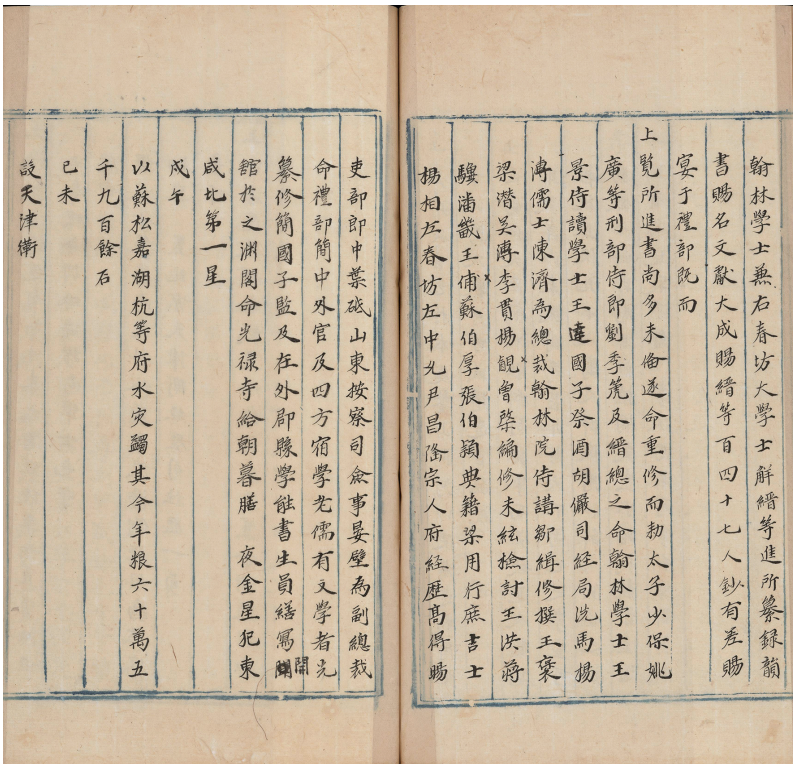
献》2009年第1期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研究》,再补充27人。2018年,笔者在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9辑发表《〈永乐大典〉纂修人续考——以方志资料为中心》,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98人。以上所考出的,除去重复者不计,总计已得413人,与总数相比虽然仅1/6左右,但已较为可观。

我们现在考证《永乐大典》纂修人,依赖的资料主要是明人文集和地方志。如上所述,为纂修《永乐大典》,礼部从全国征召官员和文士,他们经由纂修工作结成了一个交游网络,互相有很多文字酬答,其中有些人著有诗文集,留下了可资参考的资料。这里仅举一个例子:副总裁王褒的《养静文集》,记录了与多位纂修同仁的交往,如《送无为周别驾序》谓:“圣朝崇文治……制《永乐大典》,予忝史官,叨备总裁。庐陵邹以信氏以婺源令,诸暨周维新氏以太学生,俱在纂修之列。书成,以信以近臣荐,迁为无为州守,且三载矣。维新历事夏官,有能声,擢无为州别驾。”这一篇文章便列出了庐陵邹以信、诸暨周维新两位纂修人,还记载了书成之后他们的升迁轨迹。

地方志则是较明人文集资料更为丰富的史料。很多纂修人并非名儒高官,史书中没有留下姓名,但在地方州县,参与纂修《永乐大典》不失为一种荣耀,因而州县志书多有记载。这样的例子为数甚多,比如福建龙溪(今漳州)人陈或,《(嘉靖)龙溪县志》有传:“陈或,应天府中。补太学生,与修《永乐大典》,授刑部主事,升员外郎。”又如浙江富阳何恭,《(康熙)富阳县志》有传:“何恭,字致安。坊郡人。永乐乙酉乡荐入太学,与修《永乐大典》。授山东益都县丞,奉法循理。”乙酉即永乐三年。

从我们搜集到的资料看,全国大部分省份的方志,都有当地人士与修《永乐大典》的记载,可见当时的确是从全国范围内遴选纂修人的。正是由于集中了天下的文士英才,搜罗宏富,规制宏伟的《永乐大典》方能在短短几年间完成编纂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图书馆)



明抄本《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》中下令启动编纂《永乐大典》的记载
国家图书馆藏